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Le Neutr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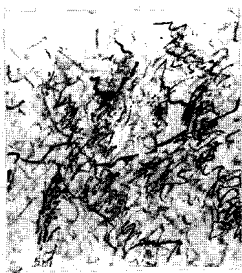
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 (1977—1978)

[法]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张祖建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尔特文集



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 (1977—1978)

[法]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 著

托马·克莱尔 (Thomas Clerc) / 文字辑录、诠释、推介

张祖建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性/ (法) 巴尔特著, (法) 托马·克莱尔文字辑录、诠释、推介; 张祖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罗兰·巴尔特文集)
ISBN 978-7-300-11972-4

- I. ①中…
II. ①巴…②张…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421 号

罗兰·巴尔特文集

中性

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 (1977—1978)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托马·克莱尔 文字辑录、诠释、推介

张祖建 译

Zhongx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插页 3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0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罗兰·巴尔特（1915—1980）是已故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思想家和理论家，结构主义运动主要代表者之一，并被学界公认为法国文学符号学和法国新批评的创始人。其一生经历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学期（1962—1976）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后留下了5卷本全集约6 000页和3卷本讲演录近千页。这7 000页的文稿，表现出了作者在文学、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学诸领域内的卓越艺术品鉴力和理论想象力，因此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时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学内最称活跃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领域，巴尔特的学术影响力仍然是其他

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难以企及的。

1980年春，当代法国两位文学理论大师罗兰·巴尔特和保罗·萨特于三周之内相继谢世，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乃至西方两大文学思潮——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终结。4月中旬萨特出殡时，数万人随棺送行，场面壮观；而3月下旬巴尔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园下葬时，仅有百十位朋友学生送别（包括格雷马斯和福科）。两人都是福楼拜的热爱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学实践方式非常不同，最后是萨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内福楼拜墓穴附近。萨特是雅俗共赏的社会名流，巴尔特则仅能享誉学界。

1976年，巴尔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资历的背景（据说20世纪50年代末列维-斯特劳斯还曾否定过巴尔特参加研究生论文计划的资格），在福科推荐下，得以破格进入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1977年1月，挽臂随其步入就职讲演大厅的是他的母亲。8个月后，与其厮守一生的母亲故世，巴尔特顿失精神依恃。在一次伤不致死的车祸后，1980年，时当盛年的巴尔特，竟“自愿”随母而去，留下了有关其死前真实心迹和其未了（小说）写作遗愿之谜。去世前两个月，他刚完成其最后一部讲演稿文本《小说的准备》，这也是他交付法兰西学院及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则是他结束6年疗养院读书生活后，对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屈辱的法国文坛所做的第一次“个人文学立场宣言”。这份文学宣言书是直接针对他所景仰的萨特同时期发表的另一份文学宣言书《什么是文学？》的。结果，30年间，没有进入过作为法国智慧资历象征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巴尔特，却逐渐在文学学术思想界取代了萨特的影响力，后者不仅曾为“高师”哲学系高材生，并且日后成为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如今，萨特的社会知名度仍然远远大于巴尔特，而后的学术思想遗产的理论价值则明显超过了前者。不过应当

说，两人各为 20 世纪文学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遗产。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是 19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我们不妨说罗兰·巴尔特是 20 世纪“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请参阅附论《罗兰·巴尔特：当代西方文学思想的一面镜子》）。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内容和形成条件变迁甚巨，“文学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学之“思想”不再专指作品的内容（其价值和意义须参照时代文化和社会整体的演变来确定），而须特别指“文学性话语”之“构成机制”（形式结构）。对于 20 世纪特别是战后的环境而言，“文学实践”的重心或主体已大幅度地转移到批评和理论方面，“文学思想”从而进一步相关于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环境、条件和目的等方面。后者遂与文学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与作为文学实践“材料”（素材）的内容（“所指”）研究疏远。而在当代西方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处于文学科学派和文学哲学派中间，并处于理论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间的罗兰·巴尔特文学符号学，遂具有最能代表当代“文学思想”的资格。巴尔特的文学结构主义的影响和意义，也就因此既不限于战后的法国，也不限于文学理论界，而可扩展至以广义“文学”为标志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选的这套“罗兰·巴尔特文集”，目前包括 10 卷 12 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罗兰·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基本面貌。由于版权问题，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将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① 关心巴尔特文学思想和理论的读者，当然

① 在“10 卷 12 部作品”之后，已经获得版权的巴尔特作品有：《萨德·傅立叶·罗犹拉》（1971）、《明室》（1979）、《中国行日记》（1974）、《哀悼日记》（1977—1979）、《偶遇琐记·作家索莱尔斯》、《恋人絮语》（1974—1976），并有附卷《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Herve Algalavrondo 著）。——编者注

可以参照国内其他巴尔特译著，以扩大对作者思想学术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还精选了菲利普·罗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尔特评传：《罗兰·巴尔特传》（1985），作为本文集的附卷。

现将文集目前所收卷目及中译者列示于下：

1. 写作的零度（1953）·新文学批评论文集（1972）·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1977）：李幼蒸
 2. 米什莱（1954）：张祖建
 3. 文艺批评文集（1964）：张智庭（怀宇）
 4. 埃菲尔铁塔（1964）：李幼蒸
 5. 符号学原理（1964）：李幼蒸
 6. 符号学历险（1985）：李幼蒸
 7. 罗兰·巴尔特自述（1976）：张智庭
 8. 如何共同生活（讲演集1）（2002）：张智庭
 9. 中性（讲演集2）（2002）：张祖建
 10. 小说的准备（讲演集3）：李幼蒸
- 附卷：罗兰·巴尔特传：张祖建

讲演集是在法国巴尔特专家埃里克·马蒂（Eric Marty）主持下根据作者的手写稿和录音带，费时多年编辑而成的。这三部由讲演稿编成的著作与已经出版的5卷本全集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翻译的难度也相对大一些。由于法文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用语抽象，不易安排法中术语的准确对译，各位译者的理解和处理也就不尽相同，所以这部文集的术语并不强求全部统一，生僻语词则附以原文和适当说明。本文集大致涉及罗兰·巴尔特著作内容中以下五个主要方面：文本理论、符号学理论、作品批评、文化批评、讲演集。关于各卷内容概要和背景介绍，请参见各卷译者序或译后记。

在组织翻译这套文集时，出版社和译者曾多方设法邀约适当人

选共同参与译事，但最后能够投入文集翻译工作的目前仅为我们三人。张智庭先生（笔名怀宇）和张祖建先生都是法语专家。张智庭先生为国内最早从事巴尔特研究和翻译的学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关译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上，张智庭先生对法国符号学的独到见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后他陆续出版了不少巴尔特译著。张祖建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文学系，后在美国获语言学博士学位，长期在法国和美国任教至今，并有多种理论性译著出版。我本人在法语修养上本来是最无资格处理文学性较强的翻译工作的，最后决定勉为其难，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固然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几篇巴尔特旧译纳入文集，但更为主要的动力则源自我本人多年来对作者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偏爱。大约30年前，当我从一本包含20篇结构主义文章的选集中挑选了巴尔特的《历史的话语》这一篇译出以来，他的思想即成为我研究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主要“引线”之一。在比较熟悉哲学性理论话语之后，1977年下半年，我发现了将具体性和抽象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而结构主义之中，又以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最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这种认知当然也与我那时开始研习电影符号学的经验有关。我大约于是于20世纪70年代末同时将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和克里斯丁·麦茨、艾柯等人的电影符号学纳入我的研究视野的。1984年回国后，在进行预定的哲学本业著译计划的同时，我竟在学术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编选翻译了那本国内（包括港、澳、台）最早出版的巴尔特文学理论文集，虽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仅不易为当时长期与世界思想脱节的国内文学理论界主流所了解，也并不易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学批评的中国学人所了解。结果两年来在多家出版社连续碰壁，拖延再三之后，才于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要感谢当时刚设立的

“世界与中国”丛书计划，该丛书还把我当时无法在电影界出版的一部电影符号学译文集收入)。这次在将几篇旧译纳入本文集时，也趁便对原先比较粗糙的译文进行了改进和订正。我之所以决定承担巴尔特最后之作《小说的准备》的译事工作，一方面是“从感情上”了结我和作者的一段（一相情愿的）“文字缘”，即有意承担下来他的第一部 and 最后一部书的译事，另一方面也想“参与体验”一段作者在母亲去世后心情极度灰暗的最后日子里所完成的最后一次“美学历程”。我自己虽然是“不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但文学趣味始终是兼及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这两个方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之后决定出版另一位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文集，周蔚华总编、徐莉副总编、人文分社司马兰社长，表现了对新型人文理论的积极关注态度，令人欣慰。本文集策划编辑李颜女士在选题和编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判断和组织作用。责任编辑姜颖映女士、翟江虹女士、李学伟先生等在审校稿件方面尽心负责，对于译文误差亦多所更正。对于出版社同仁这种热心支持学术出版的敬业精神，我和其他两位译者均表感佩。

最后，我在此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约请我担任一部结构主义文集总序的撰写人一事表示谢意。这不仅是对我的学术工作的信任，也为我提供了再一次深入研习罗兰·巴尔特思想和理论的机会。巴尔特文学思想与我们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距离。为了向读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参考，我特撰写了“附论”一文载于书后，聊备有兴趣的读者参阅。评论不妥之处，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

2007年3月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译者前言

从1977年1月到1980年3月6日去世之前，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连续讲授了三门与“文学符号学”有关的课程，“中性”是其中第二门课（1978年2—6月）。这三门课程虽然题目不同，却有着明显的连贯性，是一个整体。2002年，三门课的讲稿终获刊行。

当年62岁的巴尔特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20世纪50—60年代，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符号学理论和叙事学，以及包括服饰在内的各种视觉艺术、饮食、汽车、戏剧和《圣经》等众多社会现象。巴尔特当年是整个结构主义思潮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进入70年代以后，他从理论性著述转入更加关注文化现象的散文写作。

在“中性”这一课程中，巴尔特完全脱离了他一度成功地倡导和示范过的、以二元对立原则为特点的结构主义方法，转向另一个视野——中性，而且直截了当地把中性定义为一个能够消除二元对立原则的概念。他从语法概念“中性”入手，将其涵盖面扩大到写作活动、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行为等不同领域，力图展示中性的非冲突和非说教的性质对于西方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等话语的丰富意义。巴尔特素以不断开拓知名，关于中性的思想无疑标志着其思想历程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

关于中性的思想轨迹大概可追溯到巴尔特 1953 年发表的《写作的零度》。1971 年，他在《原样》杂志上把自己 20 多年来的工作概括为“陶醉于一场追求科学性之梦”。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里，他也大谈在“幻象”的指引下“教授己所不知”，这些似乎都预告了他将另辟蹊径。但是直到在这门课上，巴尔特才开始全面阐发关于中性的新思想（虽然备课笔记未能全部讲完）。在讨论中性的 23 种正面和负面的表现时，巴尔特做出的征引可谓蔚为大观，从老庄、禅宗、古希腊智者和怀疑派、中世纪德国玄学、卢梭、波德莱尔、托尔斯泰、本雅明、纪德、尼采，直到戏剧、音乐和绘画艺术。我们觉得，这些广征博引的用意之一是打消“中性本是消极的”的素常理解，证明中性所展现的前景在无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层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摆脱冲突性的、僵硬的二元思维模式，避开非此即彼的意指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行为和责任。此外，例如他说：“对于中性的思考是我在与时代的抗争中一种寻找自身风格的方式——一种自由的方式”（《中性》，33 页^①），“我希望循着细微的差异去生活”（《中性》，

① 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后文不再一一注明。——编者注

37 页)。这些话既可视作巴尔特心声的告白，也是他一贯反对权势和因循守旧的鲜明个性的反映。在这门课上，巴尔特还第一次公开了他的案头阅读书目，它们大部分来自于他在乡下的藏书。这些对于研究巴尔特的思想源流无疑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了解巴尔特有关中性的思想，不应忽略这门课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巴尔特有个著名的社会语言学观点：“全部语言结构就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语言为权势服务。”（见《就职演讲》）在后结构主义时期，“个人在日常生活里如何摆脱受到包括语言结构在内的各类权势的支配”是一个法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就在这门课开讲以前，他在接受摩洛哥《见解》杂志的采访时，对于总是被要求取此舍彼，甚至做出凌驾一切的针砭表示厌恶，呼吁享有悬置判断的权利（《巴尔特全集》，第 5 卷，539～540 页）。对于这种关心和忧虑，《中性》再次作出回答。如果说，在上一年的课程“如何共同生活”里，巴尔特提出的答案是“独修”（*idiorhythmie*），即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找到、实现和保存自身生活节奏的方式，“中性”则在更大范围内探讨了冲破语言和观念形态的束缚的方法和前景，尽管巴尔特把“中性”叫做“欲望”和“幻象”，即现实所无的理想境界。

那么，“中性”究竟是什么？我们这里只提出几点常见的误解，供读者判断。首先涉及中性的认识论背景。根据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A 与 B 两项之间的对立是任何纵聚合关系的基础，即所谓二元性或者二项对立。二者必居其一方可产生意义（例如音位学上的区别性特征）。这种纵聚合关系的二元性却被中性所打破。中性被定义为既非 A，亦非 B，代表着另外一个迥然不同的领域。既如此，它很容易被混同于 A 与 B 中和之后的第三个结构项——零度。在《写作的零度》里，中性曾被用做零度的同义语。

巴尔特在这门课上则试图把中性与零度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仍属对立性纵聚合关系，中性却“避开聚合关系和冲突”，是一个“用非聚合关系的强度构成的领域”（《中性》，246页）。其实，巴尔特两年前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提出的“中性”的定义是与此一致的：“中性不是积极与消极的平均值……简单地说，我们不妨认为它是一个跟二律背反相反的东西……在既是语义的，也是冲突性的一组对立当中，中性不是第三项——零度；它位于无限的语链的另一个环节，是一种新的聚合关系的第二项，其原初项是暴力（争斗、赢取、做戏、傲慢）。”（132~133页）显然，用三元结构取代二元结构绝不是巴尔特的本意。

其次是“中性=躲避矛盾”。这门课结束以后的1979年2月，巴尔特在北美《法语评论》的访谈里重申中性“并不是彻底和全面的退隐”，而是要“寻找新的介入领域”。他提醒说，勿把中性当成一副治疗现代社会的弊病的现成良药，他从事的只是一种试验，是为了摆脱观念形态和语言的陈旧代码而发掘新的前景。读者对巴尔特所说的中性将有自己的理解，但至少，巴尔特不会把本质上非说教的中性本身变成说教。

再次涉及如何评价结构主义。巴尔特在这门课上触及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定位（只分析意指作用的有效性，不涉及话语的真理性）和局限（只讲对立，缺乏有关程度的方法论概念），而且假如这位结构主义大师能够进一步谈下去的话，那无疑会很有意思。可是，巴尔特看来只是针对二元对立的思想后果而发，目的不是全面否定和清算结构主义，而是指出一条被成见所贬斥，被时代所忽略的不同的思路。

最后，这部讲稿多次引用老庄和禅宗的思想，视之为中性的正

面表现。中国读者自然关心巴尔特对东方哲学究竟有多少了解。对此巴尔特其实十分清醒。在上文提到的《法语评论》的采访中，到过日本和中国的巴尔特说，西方人碍于语言很难真正进入东方哲学，他们能看到的“顶多只是一道模糊的光影”；不过，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东方哲学毕竟代表着“一种真切的外异性”，而且西方需要“我”与“他”之间的碰撞（《巴尔特全集》，第5卷，539~540页）。这些话应当看做巴尔特对待东方思想的基本态度，至于引用得是否处处贴切，倒还在其次。

总之，从《中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思想敏锐深邃、学识广博深厚、拒绝因袭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巴尔特。借用一个巴尔特喜用的比喻：“中性者，波纹之谓也：外表有着细腻的变化，意义或许也有细腻的变化，要看主体从哪个角度关注它。”（《中性》，83页）希望这个译本有助于读者领会“中性”的丰富性，从而增进对巴尔特晚期思想的了解。

还需对《中性》中文译本体例做如下说明：

——每页脚注为原文注解；也有一些译者说明，都标为译者注。

——原文左侧页边的文字用 [[黑体双方括号 10 号字]] 括起；

——原文斜体字仍用斜体字。

——凡原文中西文的汉译名，或者汉译的西文原文用字，均用 { } 号扩起；例如 veritas {真理}；原文脚注另有说明者不在此例。

——译者照录了原文注解中的缩写字 OC 表示巴黎色伊出版社 1994—1995 版《罗兰·巴尔特全集》；例如 OC-Ⅲ，177 是指《罗兰·巴尔特全集》卷 3，第 177 页。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中性》的英译本（*The Neutral*, by Roland Barthes, translated by Rosalind E. Krauss and Denis Holli-

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5), 在这里向两位英语译者致谢。另外要感谢老友比德加拉 (Philippe Bidegaray) 和吉尔比埃 (Laurent Gerbier) 多次移烛相照, 以及人大出版社李颜、翟江虹、赵建荣等编辑的细致工作。译者虽尽力大致不离地传达思想家兼散文家巴尔特的文理和意趣, 但疏误与力所不逮之处, 还望得到识者教正。

张祖建

2008 年 9 月 20 日

于加州佛利蒙市

这项巴尔特所授课程的刊行工程已经有一篇总“前言”，本说明为其概要。“前言”的内容详见上一部题为《如何共同生活》的讲稿。

授课进度是编排每一部讲稿的依据。这是真实的阅读节奏，也是巴尔特每次下课以后在手稿上标注的节奏。他逐日注明当日几点讲至何处，下一个星期当从何处讲起。

经过这样的界分，这部讲稿便有了自身的结构，其中包括“特征”或段落的主题，即与整个题旨衔接起来的单位，以及标题、小标题、纵向书写的列举等，后者在一个段落或一项“特征”的内部形成次一级的衔接单位。

我们对课程本身的“文本”采取了尽量少介入

的原则。我们保留了巴尔特在表示例如某种逻辑结构时所运用的一些简写符号。不过，如果某个缩写词属于常见的惯用表达方式（例如《鲁宾逊漂流记》缩写为 R. C.^①），我们便主动保留了补全此类缩写词的权利，或者纠正了有时过于含混的标点符号。

如果出现巴尔特所写的内容过于晦涩难懂的情形，为使读者免于不必要的困惑，我们在脚注里把中心意思换个说法重申一遍。需要补充的是，我们保留了巴尔特亲自删去的为数不多的若干段落，并且相应地在脚注里说明了删减的起止之处。如果每一课的讲稿前面冠有对来函或者前一周话题的评论，此类文字均用斜体字排印。最后应当说明，讲稿中凡属编辑人员的介入文字均用方括弧“[]”括起，凡是巴尔特本人介入讲稿的引文之处，则用尖括弧“〈 〉”括起。

所有的脚注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疏注，对于这样一部经常只是点到为止的讲稿来说，这是十分必要的。凡属征引文字、专名、外文（尤其是用拉丁字母转写的古希腊文）、地名、历史事件，只要能够做到，我们都在脚注里一一做出解释。一份完整的“文献索引”也避免了脚注过于繁冗。除了这份人名和书名的索引^②以外，我们还补编了一份“主题索引”，但未加解说，仅按字母排序而已。此外亦需说明，如果巴尔特提到的参考文献的版本过于陈旧或者湮没难求，我们就在脚注中为读者推荐了一个相对容易觅得的版本。

一篇简短的前言介绍了这门课的背景和突出的特点。

① 指这部小说的英文名字“Robinson Crusoe”两词的开首字母。——译者注

② 原著未见这样一份“文献索引”，原著末尾的专名索引也只列人名，未举参考文献。这里也许指巴尔特在下文“篇中篇”里开列的参考书目。——译者注